
从武夷到武汉

——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

孙万¹ 阮陞灵²¹

(1. 中共南平市委党校, 福建 南平 353006;

2.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万里茶道”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媲美新世纪油气管道的近代中俄“世纪动脉”。梳理万里茶道从供给侧原产地驱动的传统晋商万里茶道, 转向供给侧产业生产驱动的近代万里茶道。本文针对万里茶道近代化的历程, 梳理这一转向蕴含着自然经济升级至商品经济、经济作物优先于粮食作物被纳入世界市场、盎格、鲁撒克逊治下“和平”殖民主义的经济影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用新思想政治话语再诠释“武夷”到“武汉”间的万里茶道近代化转向历程, 解读在国际大生产和世界市场结构性变革视域下的贸易变迁与经济依附。

【关键词】: 万里茶道 武夷 武汉 世界市场 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 TS971 **【文献标识码】** A

万里茶道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下三大贸易商品之一茶叶, 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重要进程。从武夷到武汉的“换挡起步”, 以国内形势、国际市场和世界格局的“古今未有之大变局”, 促成了万里茶道近代化转向。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政策背景下, 梳理万里茶道近代化进程, 沿线城市探索生态经济助力新时代万里茶道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1 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历程

万里茶道孕育于茶马互市, 中原王朝与跨境民族存在着脉冲式的局部战争与边境贸易格局。除了边茶针对性互市以外, 江南产区茶产地自五代、宋朝开始成为商品经济的贸易商品, 至明清时期与丝绸、陶瓷、南京棉(花)等商品共同成为跨国贸易的重要商品。由于俄罗斯东进改变了东北亚格局, 明清两朝的中原王朝对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格局发生改变, 特别是有清以来, 清初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近代条约体系, 获得俄罗斯对于清朝稳定蒙古高原局势的中立态度, 同时安排了北京互市、恰克图互市、祖鲁海图互市、尼布楚互市的四大贸易点, 构建了中俄贸易平定准噶尔战后贸易格局。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与贸易格局调整后, 交易集中于恰克图边贸榷场。清朝统治者乾隆评价恰克图边贸为“彼以皮来, 我以茶往”, 并且古代茶叶皮草贸易商路自福建武夷延伸至莫斯科, 全程超过 4.5 万里, 路途漫长, 史称“万里茶道”。

基金项目: 2019 年度南平市校院系统研究课题一般项目“‘万里茶道’品牌的国际影响研究”; 2018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武夷山制茶史研究”(编号: FJ2018C062)。

作者简介: 孙万(1989—), 男, 福建南平人, 中共南平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助教, 国际政治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 阮陞灵(1990—), 女, 京族, 越南河内人,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硕士,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

万里茶道的古代部分是兴起于《恰克图互市条约》，中断于太平天国运动阻滞江南茶产区对晋商万里茶道的贸易商品供给。晋商主导旅蒙输俄茶贸易，运用清政府对驻蒙军队提供军资运输的服务交换边境贸易市场茶叶贸易特许权“茶引”，依托市场准入优势对江南产区茶原产地进行赎买、与山场联合经营，构筑足以供给长期贸易的稳定茶叶供给侧基础。

万里茶道的近代部分是清朝对西方多国的《北京条约》体系，特别是英俄两国利用各自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利权，依托长江经济带沿线上的开埠通商城市，进入武汉汉口截流收购茶青，整合羊楼洞、安化的两湖茶产业原材料，利用工业生产相对于手工业生产的生产力优势在汉口争夺茶叶生产与转运的贸易利益。万里茶道的近代部分的终焉，在于英俄汉口争茶后，英国淡出中国茶叶市场，转向开发锡金大吉岭地区、印度阿萨姆地区、斯里兰卡锡兰地区的新兴茶产地，俄国以在华砖茶厂、西伯利亚铁路和贯通欧亚的远东舰队航运，维持万里茶道至十月革命终止。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突出表象是太平天国运动至北京条约期间，战争对于产地生产和商路运输的破坏。战后复苏并未按照战前的贸易格局恢复，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内战使得国力削弱、对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外战辱国丧权。《北京条约》体系下的国际茶贸易格局必然发生变化，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型成为必然。

2 近代转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蕴含着自然经济逻辑向商品经济逻辑的思维转换，经济作物优先于粮食作物被纳入世界市场的国际因素，还有全球茶叶生产供给侧的巨大变革。

2.1 思维转换

中原王朝的军事安全压力来自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满清从白山黑水的中国东北入关控制中原建立新的王朝更是对这一国家安全观有深刻的理解，满清与科尔沁等漠南蒙古势力形成满蒙联合，间接稳定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部落，并探索拓展驻蒙军事存在以外的治理能力。经济战略成为和平红利下的可选项之一，同时满足驻蒙军事所需的物资需求并保障联通库伦、乌里雅苏台等蒙古高原要地的交通通畅。不同于宋、明边境榷场茶马互市，贸易对象即是战争冲突情况下主要矛盾的利益矛盾双方，清-蒙-俄的贸易格局是中俄在初步稳定的藩国蒙古边境，即新边疆上进行贸易，是以统战笼络蒙古王公并与阶段性盟友俄国进行贸易，以一种“远交近攻”的姿态在进行多边安全重构。

万里茶道的贸易首先基于对清朝对蒙驻军的军事存在的物资运输保障为前提，维持对藩国的安全管控。添加蒙古王公为参与到边境贸易的参与方，部分边贸红利与税收成为对藩国控制辖区的经济支持，巩固蒙古王公在地统治基础。对俄输出茶叶的换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皮草、金银器等。三者的多边关系构成近代东北亚关系的雏形。

恰克图互市之外，终止北京互市、祖鲁海图互市、尼布楚互市的贸易，京城互市是来到北京的“朝贡贸易”模式，进入京畿直隶地区。清政府基于传统的理藩外交传统，将进京朝贡视为一种荣誉，俄国显然不具备等同于朝鲜与琉球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参照于葡萄牙人广州贸易的边贸形式，较为稳妥。同时祖鲁海图、尼布楚两地位于中国东北，距离关外满清龙兴之地太近。满清入关后移民大量女真族人口，使得中国东北人口稀少，客观上造成政治真空，故而封禁东北。祖鲁海图、尼布楚两互市榷场，其设立是两次中俄雅克萨之战所形成战略均势的结果。其废止也因处于中俄外兴安岭东北段边境沿线，又因人口稀少缺乏贸易需求，且因交通不畅运输成本高起。故而，基于国家政治安全需求将贸易集中到恰克图。

政治考量之外，不可忽略的是经济考量。自然经济存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贸易中的谈判力来源于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刚性程度。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茶叶是肉食为主的人口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主要的最优选择，欧洲国家的饮茶需求在工业革命之前以贵族奢侈品形式存在。虽然两者需求的原因不同，但是两者都呈现出强烈的需求刚性，而供给侧的茶叶生产主要以江南产区的贸易茶为主。针对西藏贸易的雅州茶、川茶，并不属于贸易茶，而是中原王朝治理西藏的重要经济贸易手段。

基于英国和葡萄牙所达成的英葡永久同盟关系，英葡在广州获取江南产区的茶叶货源，俄罗斯也在恰克图获取千里贩运而来的江南产区的茶叶货源。故而，英俄争茶的利益冲突不局限于汉口争茶的局限，而是贯穿于 18 世纪以来国际茶贸易全程。

基于应对需求刚性与供给刚性的博弈，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唯一产茶国的独特优势，国内市场上征收茶叶税，取消“茶引”的生产独占权，而控制贸易口岸，转而寻租并借售在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独占权，促成以伍秉鉴为代表的广州十三行成为广州英葡贸易的中方主要经营承办者，同时以晋商长裕川、大盛魁、榆次常家等晋商商帮成为恰克图对俄贸易的中方主要经营承办者。中原王朝控制贸易口岸这一枢纽性的地缘优势，集中边贸的商品形成规模化的谈判力，获取供给侧压制需求侧的超额利润优势，是生产处于自然经济条件，贸易监管水平提留在配额特许经营制度阶段的最优选择。

英俄都曾经尝试打破中原王朝建立在自然经济逻辑上的最优解。俄罗斯在恰克图互市制造了三次贸易摩擦，清朝予以三次关闭恰克图市场的贸易战回击，累计关闭恰克图市场 15 年（1762 至 1768、1778 至 1780、1785 至 1792 年），间接促成茶（叶）（大）黄制夷论的思想，即使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前期也秉持通过茶叶和大黄贸易来制衡红毛夷人和南蛮人的思想认识。英国、荷兰也曾试图以取代葡澳或建设新贸易港作为新的对华贸易商站，这些军事手段都在中国和葡澳的军事对抗和贸易回绝的政治合力下破产。西方要夺取恰克图和广州的茶叶边贸利益，症结夺取贸易门户，而在于击溃中原王朝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帝国控制能力。英国主导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福建的局部战争都不能够有效伤害中原王朝外贸港和茶叶等商品物资转运体系，而战争的结果是《江宁条约》，签署条约的地点恰恰是帝国的罅门与死穴。鸦片战争阶段英国于 1842 年 4 月至 1843 年 7 月驻军宁波，控制威胁整个中原王朝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动脉的南北物资转运、以长江水系为主动脉东西物资转运体系的枢纽江宁。江宁江宁，长江不灵、国家不宁。国家水路物流网的失灵、外埠口岸的洋行争利、战争的生产破坏、战争赔款的赋税增加，促使国内矛盾的激化，太平天国的起义内战和中原王朝对农民造反的暴力平定，破坏了中原王朝最富庶的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产区，中原王朝遭遇自然经济的粮食安全与商品经济的安全两大系统性国家治理风险同时爆发。

故而，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农业封建帝国时期的中原王朝形成的国家安全观与其派生的制度安排，是千年来对外北方军事威胁和对内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优配置，基于政治经济传统所做国家安全和经济规划的顶层设计，其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

2.2 农业封建帝国与农业帝国主义的竞争

万里茶道为主的中俄茶贸易与十三行为代表的中茶贸易，在中原王朝国内区域内茶道沿线共同创造了茶叶繁荣。受益于国际茶贸易带来了外贸稳定且不断增长的需求，江南产区以及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开始效法武夷小种红茶制作针对外贸需求导向的红茶，而非针对国内需求导向的绿茶。清政府强化贸易口岸管理，活化茶叶经济作物生产与制作的策略，使得江南地区从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从宋代民谚称“苏湖熟天下足”，明清民谚“湖广熟天下足”，南京棉、生丝蚕桑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广，促成了苏湖、湖广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的农业转型，推动中原王朝的农业封建帝国格局达到最高峰。封建主义的优势在于分封建制和郡县制治理结合，与士大夫共天下，中原王朝与农田、山地、草原等土地所有者进行直接管制或联合统治，构成郡县制或藩王分封建制的形式，旨在“控制了土地所有者就控制了土地，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疆域”。在土地所有者的联合基础上，保障粮食安全，并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出口土地产出品作为工业原料，在西方列强还不能有效控制殖民地秩序与生产的阶段，中原王朝出口贸易农产品分享工业革命最初阶段对原材料垄断生产的超额利润。

英国在控制宁波期间，派遣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赴武夷山盗取茶种茶树，以及聘用茶工赴印度进行种植推广，在大吉岭、阿萨姆、锡兰等英属印度殖民地进行红茶生产。根源于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帝国军队对中国有组织国家犯罪行为，旨在打破中国茶叶垄断生产在供给侧的独占地位。英国本土在不断推进工业革命，但是英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体系，是将各殖民地改造成专门生产单一原材料的产地，强化各殖民地对英帝国贸易体系的依附性，巩固英国殖民统治，英帝国以贸易利益结合殖民地土邦的统治，获取非封建性权力的超然调停斡旋地位，英帝国殖民地治理的农业帝国主义政策客观上是强化依附性的、构建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殖民地农产品与初级产品生产纳入全球贸易体系。

中原王朝的帝国扩张在于探索农业生产利益最大化，针对毗邻的可耕种、可放牧的农业可用地，进行领土性郡县制直接管辖与封建性册封藩国的间接管制。中原王朝核心领土的土地产出决定了帝国新边疆的治理半径。英帝国对海外领土非封建性的兼并，是殖民地化的专门性初级产业的生产以贸易利益作为经济依附的诱因，建构殖民地国家政治上战略扈从的经济基础。宗主国-殖民地间不剥夺土地所有权，而是剥削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产出所用于交换的利润，生产力优势所形成的工农“剪刀差”格局就此形成，并贯穿于“盎格鲁-萨克逊治下的和平”殖民主义统治与后殖民主义的解殖运动，并不是放弃了军事干涉的暴力手段，而是找到了比军事占领更加有效却罩上温和面纱的世界市场统合手段。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是中原王朝的自我弱化，与破碎而未瓦解的帝国局部疆域各种被裹挟卷入世界市场和国际大分工的大格局中。传统农业封建帝国的优势堕入自然经济的窠臼，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以茶制夷的治理思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走到尽头。

2.3 全球茶产业再分布

万里茶道地理上途径闽、赣、湘、鄂、豫、晋、冀、蒙八省，沿线五省为茶产省。英国对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控制不断强化，激起印度反英民族大起义。国际层面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反殖民斗争上其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日本明治维新一起构成了亚洲革命风暴。印度国内层面，罗伯特·福琼从中国武夷带来的茶种在印度东北邦的试种成功并大规模推广，不仅征用殖民地奴工，并且干涉当地土邦间的利益格局。激起印度大起义三大领导人昆瓦尔·辛格的反抗，其70岁高龄带领茶叶产区大吉岭南方比哈尔邦地区农民进行游击战争，一度切断加尔各答与贝拿勒斯间的交通线，战火延烧到印度中部安得拉邦海德拉巴。国际茶贸易从武夷中国茶逐步转向英属印度殖民地提供贸易茶。生产格局促使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产业迁移带来的“茶叶繁荣”引发利益格局变化、本地土邦统治利益和殖民地种植园奴工利益的难以调和，是英国暴力改造世界市场格局和国际大生产分布格局的必然结果。

万里茶道的茶叶生产从武夷转向武汉，两湖的羊落洞、安化成为更加靠近开埠通商城市汉口的茶叶产地，而武夷茶转向开埠通商城市福州对接世界市场。南北两大边贸口岸广州和恰克图的特许贸易权被《北京条约》的武汉开埠改变，汉口成为原陆上万里茶道和原海上万里茶道的长江经济带最接近江南产区核心的“九省通衢”贸易商站。

英俄汉口争茶的本质是英国在英属印度二次控制殖民地并强化对殖民地生产的复苏阶段，对欧洲以及殖民地地区茶叶需求旺盛的巨大供求缺口矛盾，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争取到不断增长的国际茶贸易优势，要求修改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允许俄商与英商的洋行一同享受片面最惠国利益均沾的超国民待遇税收优惠。俄商洋行的贸易对手是晋商依然存在，未有近代银行进入的中国，晋商商帮已经完成以钱庄为代表的近代金融化，而英商洋行贸易对手是十三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摊派战争赔款等原因，以伍秉坚为代表的十三行已名存实亡。英国走“粤汉线”北上武汉，俄国急于地理上跨越恰克图互市的边贸限制，贸易上超越以晋商商帮为代表的华商和英国洋行为代表的洋商这一竞争对手，武汉汉口成为，陆上海上两路“万里茶道”在中国内水的利益交锋处。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长期视角下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锡金大吉岭和印度阿萨姆的茶产区崛起，回归具体历史年鉴切片，恰恰是英国调整殖民地原有农业生产格局的结果。英帝国以“工业英国农业印度”方式重塑殖民地贸易农业生产，印度殖民地也成为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英帝国获得稳定且大规模的茶叶产地后，淡出中国茶产地。俄国夺取汉口争茶中对英商洋行和对华商晋商商号的胜利，取得在华茶贸易的独占优势。

3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的成就与挫折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是产茶转向制茶产业升级的供给侧生产变革，是国内自然经济生产格局与国际商品经济贸易格局的生产力竞争结果，是中国自然经济结构以破碎区域形式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竞争。在国际茶贸易上，创造了汉口、福州、上海

三大茶港的“茶叶繁荣”奇迹。

武汉的茶叶贸易在俄商占据优势后，从传统的陆上万里茶道转型为海陆结合的茶道，俄商通过义勇舰社（Russian Volunteer Fleet）开辟汉口—敖德萨定期航线直欧洲，抑或是汉口—天津登陆上岸经传统万里茶道对接上西伯利亚铁路。汉口成为江南产区和华中产区重要的茶青集散中心和砖茶生产中心。上海则成为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的转口贸易集中地，逐步取代南京条约时代的江宁，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出口贸易的南北—东西经济动脉的新枢纽。福州的茶叶贸易因 1883 年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商帮与洋商进行茶丝贸易战，第一阶段生丝贸易战联合华人茶商联合罢市升级为茶丝贸易战，第二阶段生丝贸易战造成徽商商帮的生丝产业崩溃，第三阶段全国钱庄系统的金融系统性崩溃，第四阶段茶商受到贸易战波及受到重创，第五阶段引发中法战争，法国对越南、中国台湾和福建进行军事侵略，对福州作为茶叶贸易港的地位和福建水师、船政学堂等进行毁灭性打击。三大茶港走向被洋行控制或军事摧毁，同时经济上“茶业繁荣”并伴随产业近代化的离奇发展进程，以“在地原生政治瓦解-对外经济依附-派生政治扈从庸庸化”的“后殖民主义”政治规律得到理论性的统一与自洽。

故而，中国自然经济阶段最重要的两大出口商品茶叶和生丝被洋商控制，中国自然经济的经济作物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也不断下降，世界市场的生产再分布逐渐调整，洋商对华进口的需求刚性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供给刚性也下降了，不再是世界市场的唯一稳定的大宗农产品提供商。依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观点，英、印、中三角贸易在 1842 至 1862 年阶段，三角贸易发生结构性动摇。

中国的贸易地位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在被削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达 1% 的鸦片上瘾人口引起大量白银外流，为弥补白银外流损失而大量出口茶丝。1842 年英国绝大多数茶叶进口来自中国，生丝进口来自中国的占 45%。万里茶道在近代转向的 19 世纪 50 年代，印度出口激增，棉花、大米、靛青、亚麻仁、砂糖等工业原料和食品品的出口跃居前五名，贸易额也占据对英出口总量的一半。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也影响了北美对英国的原材料出口。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下，英帝国在植物学、生物学的博物科学指导下，将茶叶、橡胶、小麦、棉花、甘蔗等农产品在全球同纬度的相似土壤光热水气条件相似的地区，英帝国海外殖民政策的“农业帝国主义”，加剧了殖民地国家的横向南南竞争，造成了殖民地各国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生产和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破坏了各国国内产业经济升级和结构性调整的纵向升级，并且依据“制度派生”论，非革命性解殖运动不能清算宗主国的在地利益，最终建构起来的后殖民地政府延续原宗主国经济政策，“后殖民主义”的经济依附性成为非西方后发国家复兴或崛起的经济基础性的软性阻碍。“后殖民主义”的经济依赖却伴随政治独立的表象，在晚清历史阶段上表现为各地团练兴起、地方士族区域性经济近代化和政治上东南互保。

故而，万里茶道近代转向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就是传统农业国家被纳入世界市场派生近代转向的结果，无论原先的政治形态是破碎的部落或土邦联盟，抑或是统一的国家或帝国被侵略逐步肢解。万里茶道近代转向的本质是，世界市场主导国家利用传统农业封建帝国的政治优势，以农产品贸易战与军事侵略战争的经济软实力-军事硬实力的双重实力，以商养战、以战促商的范式逐步完成对传统农业国家的殖民化。

4 结语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呈现“从武夷到武汉”的历史表象，武夷茶以小种红茶为代表的种植与制法在国内茶道沿线产茶省和国际同纬度气候带上的农业与技术扩散，武汉以汉口为代表的近代开埠通商港口作为江南茶产区的茶青集散中心和砖茶制茶中心，整合长江经济带上的茶产业资源，融合恰克图与广州南北两口岸的贸易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依附洋行的国际贸易与金融部门成为茶产业集群中心，内水地理优势直接作为陆地自贸港模式的雏形。新时代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思近代世界市场的后殖民主义倾向的经济演变过程，解构世界市场发生学意义上的资源禀赋组合范式。有助于新时代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地探索近代化过程中茶产业发展给予中国的在地优势，启发产业经济思维向生态经济思维现代转向下，构建茶产业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农业化的全新历史定位格局。

参考文献:

- [1] 郭蕴深. 中俄茶叶贸易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 [2] (英) 罗伯特·福琼. 两访中国茶乡[M]. 敖雪岗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3] 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4] (日) 滨下武志, 朱荫贵, 欧阳菲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5] 董筱丹, 温铁军. 去依附: 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